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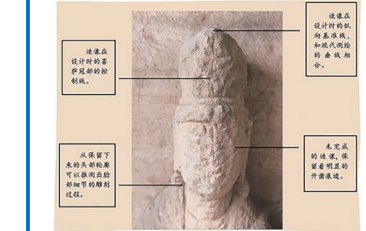
云冈石窟再发现

齐欣 赵晓霞

迈进石窟的那一刻，人们通常会经历一次震撼，难有例外。世纪之交，中国的大足石刻、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在3年内接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1987年率先成为文化遗产的莫高窟一起，这些记录了中国石窟艺术发展以及人类文化交融的宏大工程，全都令人信服地具备了成为世界遗产最难被认定的第“i”项标准：“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杰作”。



云冈石窟保留了一些未完成的造像。现在，研究者从这些未完成的造像中推断云冈造像的开凿工序、洞窟的开凿次序，进而深入讨论云冈主要洞窟与当时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这对于题记保存较少的云冈石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



古老石窟的新发现

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5世纪，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第一次造像高峰时期产生的经典巨作，也是世界石窟艺术第二个繁荣期的杰出例证。

与成为世界遗产同步，深入、系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也随即展开。约1600年前，云冈石窟前后经历60余年的营建，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佛龛共计1150多个、大小造像5.9万余尊——但是相关文字记载并不丰富。我国早期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多在建筑、雕塑、史学和宗教领域进行探讨。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学者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石窟寺研究中，将云冈石窟的研究纳入历史考古学的“轨道”，全面系统探讨石窟分期及相应的历史背景，其研究思路、方法、依据的材料和基本结论都形成了自身特点。中国学者逐渐成为云冈学发展的核心力量。

与此同时，基于世界遗产视野

寻求云冈石窟与世界的关联，也成为重要而明确的研究方向。研究者关注世界范围内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展示、利用，通过促进不同国家与民族在当代的交往融合，进而判读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意义、世界意义并与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一起，将这些细节传递给全社会。在真实、完整原则下，云冈研究者已经逐步接近再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的云冈石窟的恢宏景象：“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这些在微观和宏观领域不断扩展的认知，事实上是在重新“发现”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是北魏统一北中国之后，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所兴建的一处大型石窟群。它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模式，是艺术的经典。”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也是云冈石窟考古专家。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保护好，研究好、阐释好、展示好，让广大观众感悟好经典的永恒魅力。实现从景点、景区到旅游



茶胶寺位于柬埔寨吴哥城胜利门外，是阇耶跋摩五世国王为自己建筑的国寺。现存遗址占地面积约4.6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占地面积超1.3万平方米。茶胶寺建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可能坐落于一组规模庞大建筑群的中心位置。茶胶寺保护修复项目包括建筑本体保护修复、石刻保护、展示中心建设和环境整治。其中建筑本体修复涵盖26个修复点。图为中国援外考古队正在修复其中的庙山五塔。



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沙门统”慧曜为主事者，在武州山体之上开凿出规模宏大、气势雄浑的5座大像窟，即后世所称的“曇曜五窟”(第16至20窟)。“曇曜五窟”开凿在今天的云冈石窟西区东侧，这里自然断崖较高、断山工作量较小，是云冈石窟区最利于石窟开凿的地段。



云冈石窟第1至3窟前的古道上至今仍留有深深的车辙印。在世界遗产的视角下，云冈研究者开始从“文化线路”的视角新增添了对自身资源的认知。

目的地的转变，让云冈石窟成为一个新的文化高地。”

许多谜底逐步揭晓

近年来，在海外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云冈研究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研究方法与领域逐步拓展。中国学者从遗迹现象出发研究当年石窟工程规划；同时在微观层面上关注以前忽略的洞窟开凿相关工程遗迹，结合最新考古调查与发掘收获，考察和复原石窟工程的实施过程；通过实验考古等新方法，模拟古代凿山取石、开窟造像的实践，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

云冈造像多基于砂岩雕琢。这里的砂岩夹有泥岩、砂质泥岩；其特点是强度较低，易于雕刻的同时也极易风化。于是坍塌、风化与盐渍就成为云冈石窟的主要“杀手”。第20窟造像是来到云冈的游客们一定会合影留念的打卡地，但是，细心的观赏者可能发现，这一组造像“好像少了点什么”，西壁明显空缺。依据近年来的研究综合研判，专家们提出这是因为第20窟所在区域砂岩夹杂软弱岩层，第20窟外壁和西壁立佛可能在建造完成不久后就塌毁了。基于考古发掘整理出的130余块西壁立佛残石，2014至2015年，研究和修复工作者拼对描绘出：西立佛原形象为着通肩衣，左手上举握衣裾，右手下垂，与主佛、东立佛共同组成三世佛造像组合。这是西立佛自北魏坍塌后其形态首次被世人所认识，对于研究第20窟洞窟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云冈石窟第3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末期，规模宏大，居云冈之首。开窟造像既要经历修整崖面、雕凿粗坯、精雕细刻、窟龛彩绘等工序，又涉及施工组织、人员调配等管理问题。那古人是如何成功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石窟？1993年对第3窟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小心翼翼揭露的900余平方米遗址面积内，发现了北魏开始历代遗留下的未完工的岩基地面、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台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筑遗迹的夯土柱基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片、瓷片、石雕、钱币、建筑构件等遗物。这为考察云冈石窟在开凿时期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取石途径、石料利用以及后世沿用期间的寺院景观变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深化了学界对云冈石窟“凿山开石、因岩结构”营造工程的认识。

2010至201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云冈窟顶开展了大规模发掘，发现的两处北魏至辽金时期的寺院遗址，不仅是我国目前出土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石窟寺遗址，而且遗址中的地穴式铸造平台、熔铁炉布局也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为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 and 规模提供了新材料，并进一步确认了以云冈山顶寺院与山下石窟组合构成宗教信仰空间的新模式，此

链接

云冈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英文名称: Yungang Grottoes
列入时间: 2001年
遗产种类: 文化遗产

符合的世界遗产遴选标准:
标准(i): 云冈石窟是世界伟大的雕刻艺术的宝库之一。

标准(ii): 云冈石窟对石窟艺术的变革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标准(iii): 云冈石窟是公元5世纪中国民族大融合的特殊见证，是早期佛教艺术大规模落根中国中原地区的杰出代表。

标准(iv): 云冈石窟是世界佛教石窟艺术第二次繁荣期的最佳作品。

次发掘成果也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描述与世界的关联

今年是云冈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6月1日，云冈研究院在云冈石窟博物馆推出“中国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一周年系列特展”。研究工作者展示了自己全新的视野——选取了与云冈石窟关联的其他多国研究、保护和利用成果，与云冈石窟进行比对，展现云冈石窟作为世界范围内文化传播的典型例证的位置与关联。

“云冈石窟正在一个更广泛的维度上来理解自我，展望未来。”杭侃介绍说，“2001年，当云冈石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时，它被评价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其在受到南亚和中亚佛教石窟艺术影响的同时，又带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当地精神。这样的表述也在提醒我们，看待云冈的方式应当是世界维度的。”

斯瓦特河谷，位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平原以北的山谷中，即连接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的山麓地带。斯瓦特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一跃成为贸易往来的枢纽和佛教思想与文化交流的中心。从文献记载来看，历史上的中国求法者曾路过此地，包括公元5世纪的法显、6世纪的宋云、7世纪的玄奘以及8世纪的慧超等。此次云冈研究院以“发现斯瓦特”为主题的展览，展示和对比了意大利科学工作者在该地区已经连续开展了65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大同，古称“平城”，是万里茶道山西部分的重要节点城市，南来的商队在此休整之后，分两路继续出发，一路向东走张家口；另一路则经云冈、右玉向西走杀虎口至归化（今呼和浩特），此即古丰州道，是北魏时期丝绸之路最东端的一段，也是17至20世纪初万里茶道的一部分。

柬埔寨“吴哥古迹”同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研究者们认为，吴哥与云冈都因海陆“丝绸之路”的兴起而繁盛，因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而造就，又都因朝代更迭而一度被湮没在历史烟云中。在“重现高棉的微笑”主题展览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援外考古队员展示了自1998年开始便在该地区陆续开展的保护修复工作。吴哥古迹保护行动也代表了我国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增进国际交流的成果。

吴哥古迹中的王宫遗址位于吴哥城中心区域，占地面积约14公顷，包括空中宫殿庙山建筑、围墙、多处平台及砖石结构的建筑遗址、砂岩石及角砾岩石的水池、院落、五座塔门以及大量埋藏于地下的各类文物等。

2018年，中柬政府确认了王宫遗址修复项目立项，王宫遗址修复项目于2019年开工。

明清时期的大运河与宗教建筑文化

张雪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人工河流。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快了运河区域城市的建设。而由此形成的极具特色的运河文化，也影响了运河区域宗教建筑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明清时期，在运河沿岸城市中密集分布着众多的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例如，大运河的枢纽城市山东临清在清初时著名的寺庙和宫观就各有30多座。（清乾隆《临清州志·寺观志》）这些寺观已经成为当时城市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明代之后，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建筑大多采取统一的形制，其布局与建筑同中国传统的宫室、衙署在平面与空间上都十分近似。不过，由于建筑涉及地理环境、建筑材料、建筑工匠以及地域审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地域文化的差异也促成了建筑的多样性特色。尤其是大运河的贯通为南北地区不同建筑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载体，这当然也为运河区域的佛教、道教建筑带来了地域特色，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南北地区不同的建筑元素、建筑装饰的融通。例如，地处运河枢纽的山东济宁，其建筑受到江南园林的影响，因此也被誉为“小苏州”。这一

特色同时也反映在宗教建筑方面：始建于明代的大悲庵坐落于大闸口运河南岸（现迁新址），其建筑风格就融入江南园林的元素。坐落大运河边的北京通州佑民观本是供奉“保障漕河”的河神金花圣母，又被称为“天妃庙”，明嘉靖十四年（1535）改为道教宫观。（清·朱筠等编《日下旧闻考》）这座宫观在建筑装饰上大量使用源自江南的苏式彩画。这些事例都生动说明明清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文化沿大运河传播的史实。

明代，南自杭州、北达北京的大运河沿岸城市，清真寺很多都受到运河文化的影响。比如，在选址上，这些清真寺主要倚仗大运河以及运河区域的商业区，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对大运河环境的适应。

由于漕运的需要，明清时期运河区域出现了很多神庙，供奉各种护法船家、漕工的神灵，比如各种大王庙、河神庙、龙王庙等等。

这些神庙通常坐落



岸，尤其闸口附近更是最集中的区域。江苏徐州的大王庙就分布在运河岸边和闸口，船只在停留的时候，船家、漕工可以直接在河道中向神庙的方向祭拜，祈求船只航行、过闸顺利，“凡舟逾洪必祷焉”。（清同治《徐州府志》）大大小小的神庙成为运河沿线民间信仰的重要景观。

这些神庙通常采用当地传统的建筑形制。不过，南来北往的商贾为了酬神，有时也会按照自己所在地域的建筑风格来加以建造，因此形成多元的建筑风格。例如，清代江苏吴江县盛泽镇的大王庙就是“自（山东）济宁州诸大商始”。其建筑风格“一仿北地祠宇，凡斧斤

罢戩以及雕绘诸匠，悉用平北。故其规模迥别，眼界革新”。（《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敕封黄河福主金龙四大王庙碑记》）济宁的客商在吴江修建大王庙，但是采用了北方地区庙宇的形制、工艺，施工的还是北方工匠，自然与南方同类建筑不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大运河对于南北地区宗教建筑文化的交流传播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运河文化以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加强了中国南北地区的文化交融。运河区域的宗教建筑文化同样是动态开放的，它们既有多元化的特点，又有很强的融会性。

鉴赏

在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曾七次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船只和船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与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联系，显现出高超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对当时的中国探索世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郑和第七次，即最后一次出海之前，曾铸有一口青铜钟，为本次远航祈福之用。此钟通高83厘米，口径49厘米，厚2厘米，重77千克，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口钟呈褐绿色，覆釜形，葵口；钟钮为双龙柄，钟肩表面浮印十二组云气如意纹，腹中部有云水波浪纹，还铸有铭文、八卦、云雷等字纹；主纹饰上部环绕一周八卦纹，共五组，其中第二、四组各铸有“国泰民安”和“风调雨顺”铭文。铜钟下部的铭文为：“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大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奉，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此钟形体古朴，铸工精良，王景弘将铜钟悬挂茫荡洋山雪山寺。

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第七次奉命远航“西洋”，郑和每次下西洋前，他率领的庞大舰队一般都要在福建长乐五虎门一带集结，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等候东北季风来临再扬帆出海。在等候季风期间，郑和在王景弘的陪同下到福建各地的寺庙行香布施。五月沿闽江而上抵达南山平镇，铸此铜钟布施长乐南山三清宝殿，祈求出海航行平安，因此，又称三清宝殿铜钟。

这次航行，郑和船队从竹步西行，最远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该铜钟铭文明确记录了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纪念郑和下西洋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之一。

(杨晓君)